

# 陶渊明晚年痼疾及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李锦旺

(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阜阳 236037)

**摘要:**陶渊明晚年不幸身染痼疾,危重不愈,迁延缠绵十一年之久,最终弃疗而逝。通过对其得痼疾前后诗歌创作的全面比较与分析,可以发现这一顽疾不仅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也促使其诗歌创作发生了诸多变化。表现在:得痼疾之前其诗多抒躬耕之志,历叙耕获之事,而得痼疾之后则代之以饥困求食的主题;得痼疾之前其诗常抒琴书自娱、诗酒相乐的生活情趣,而得痼疾之后则平添了凄苦悲凉的情调;得痼疾之前其诗多写纵情山水、朋从往来之雅好,得痼疾之后这些爱好与相关创作均趋于同步消减。

**关键词:**陶渊明;痼疾;诗歌创作;变化;悲情

**中图分类号:**I206.2.3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6-0172-006

陶渊明少怀“远翥”之志,壮年断续出仕祭酒、参军、县令等职,曾游走于桓玄、刘裕、刘敬宣诸幕府。但后来审时度势,决定“逃禄而归耕”(《感士不遇赋》),走上了躬耕自资的道路。正是十余年的躬耕体验,成就了他田园诗鼻祖的地位。然而他晚年却不幸身染痼疾,迁延持续十余年,直至其病逝。陶渊明适逢劳倦多年、年事已高之际染上这一顽疾,因此它成了中止其躬耕生活的直接诱因,并对其晚年诗歌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于陶渊明本人诗文对于晚年病况叙写少而模糊,致使痼疾对其生活方式与诗歌创作带来的诸多变化不易为人察知。为了更加准确地把握陶渊明中晚年诗歌创作变化的总体态势,本文拟就该问题作一专题研讨,以便抛砖引玉,尚待方家指正。

## 一、痼疾:陶渊明晚年的不幸

陶渊明晚年身染痼疾,这在颜延之《陶征士诔》中有明确的记载:“年在中身,疾维痼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祷祀非恤。傖幽告终,怀和长毕。”<sup>[1]2474</sup>《诔》辞交待了三点信息:一是得病的时间,即“年在中身,疾维痼疾”,“中身”系五

十之典,可知他五十左右得了此病。二是病况,所谓“视死如归,临凶若吉”,当是痼疾恶化时的情形。陶渊明《与子俨等疏》亦云:“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可与颜《诔》相证。三是最后结局,即“药剂弗尝,祷祀非恤。傖幽告终,怀和长毕”。由《与子俨等疏》可知,陶渊明亦曾以药石相救,大概久药无效,也就逐渐失去了信心,最终弃疗而逝。

按《说文》:“痼,有热症。”<sup>[2]</sup>唐人元稹《痼卧闻幕中诸公征乐会饮,因有戏呈三十韵》较为直白地描述其症状曰:“胀腹看成鼓……温瘴气难排。”<sup>[3]442</sup>可知痼疾属于疟病的一种,呈现出郁热不舒之症。而中古时代尚无疗痼的特效药(按元稹《遣病十首》其一有“瘴久药难制”<sup>[3]437</sup>之叹),因此患者必将持久地经受病痛折磨。这就意味着陶渊明始得痼疾之日,即是其躬耕生活行将告终之时。而陶渊明由躬耕自资转入抱疾度日的时分野,恰在《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溪田舍获》、《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二诗中可以得到较为清晰的考察。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溪田舍获》是一首秋获诗。“丙辰”,指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诗题虽取秋获之意,但诗中却主要抒发坚持躬耕、未乖

**作者简介:**李锦旺(1971—),安徽金寨人,文学博士,阜阳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汉唐诗歌。

夙志的欣慰之感。开篇云：“贫居依稼穡，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而该诗后半部分又呼应曰：“曰余作此来，三四星火颓。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作此”、“其事”，均指农耕之事。“三四星火颓”，指火星周流了十二次，取其十二年之意。这四句是说他坚持躬耕长达十二年之久，现在虽已老迈，但仍不违初志。由义熙十二年前上溯十二年，恰是陶渊明赋辞归来的那一年，即义熙元年(405)。结合陶诗可知，归耕以来的十余年间，他开荒葺宇、植桑耘豆、春耕秋获、汲水负薪，无不亲历，有时甚至达到“四体诚乃疲”（《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的程度。除了常规劳作，他还曾遭遇过火灾，致使“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此后徙西庐、迁南村，劳碌奔波，一样难得长时休歇。因此这一时期他是不会染上痼疾这类顽症的。

义熙十二年，陶渊明又有《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时三人共在城北讲礼校书》一诗。据逯钦立所考，该诗作于义熙十二年冬<sup>[4]</sup>，与《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溪田舍获》几乎前后相接。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在开头四句中自叙的病况体验恰与痼疾症状相合：“负痼颓檐下，终日无一欣。药石有时闲，念我意中人。”药石，指石类药物。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伤寒下》“温疟第六”<sup>[5]</sup>，王焘《外台秘要方》卷五《疟病一十五门》“温疟方五首”<sup>[6]</sup>所收疗疟古方中，部分配有云母、石膏、朱砂等材料，可知陶诗确属写实。“药石有时闲”，指用药时有间断，这与疟病的间歇性发作特征也相吻合。《黄帝内经·疟论》篇剖析其机理曰：“其气之舍深，内薄于阴，阳气独发，阴邪内著，阴与阳争不得出，是以间日而作也。”<sup>[7]</sup>本诗不仅所叙之病况与颜《诔》相一致，而且又有“老夫无所爱”等语，也与颜《诔》所记“年在中身，痼维痼疾”相合。因此大致可以断定本诗所叙之病况，乃是陶渊明痼疾始发时的新鲜体验。

《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中的“负痼”与“药石”，还分别见于《赠羊长史》和《与子俨等疏》。《赠羊长史》云：“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闻君当先迈，负痼不获俱。”该诗作于义熙十三年(417)，各陶集注本均无异辞。又《与子俨等疏》云：“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疾患以来，

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该文作年，各陶谱与陶集注本有较大分歧，王瑶编注《陶渊明集》<sup>[8]</sup>与龚斌《陶渊明年谱简编》<sup>[9]</sup>系之于宋武帝永初二年(421)。若考虑陶渊明的病势，其说较为允当。宋少帝景平元年(423)，陶渊明作有《答庞参军》诗二首<sup>[10]</sup><sup>[10]</sup>，其五言诗序称：“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所叙应是痼疾久治未愈、缠绵迁延的状况。总之，从义熙十二年之后的一系列诗文来看，陶渊明病情大体是连续的，这与此前的持续躬耕恰成鲜明的对比。

以义熙十二年《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自叙的病况为标志，陶渊明开始迈入痼疾缠身的人生晚境，到他元嘉四年(427)病逝，整个病程持续十一年之久。据颜《诔》，他“年在中身，痼维痼疾”，即五十左右开始染痼，加上十一年病程，合起来享年六十余岁，这与《宋书》本传所记享年六十三岁的史实大体相合。

陶渊明独善一生，饮誉乡里，却晚婴痼疾，可谓德高命蹇，颜《诔》对此深致憾恨：

嗟乎若士！望古遥集。韬此洪族，蔑彼名级。睦亲之行，至自非敦。然诺之信，重于布言。廉深简絮，贞夷粹温。……世霸虚礼，州壤推风。孝惟义养，道必怀邦。……隐约就闲，迁延辞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纠纆斡流，冥漠报施。李善注：《鹏鸟赋》曰：斡流而迁，或推而还。夫祸之与福，何异纠纆？……《史记》司马迁曰：天之报施善人何如哉？孰云与仁？实疑明智。谓天盖高，胡讐斯义？履信曷凭？思顺何置？年在中身，痼维痼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禱祀非恤。徕幽告终，怀和长毕。<sup>[1]</sup><sup>[2473-2474]</sup>

如果不是痼疾给陶渊明的晚年带来了太多的不幸，颜《诔》断不会以一连串的疑问语句感慨祸福无常，诘问天道不公，叹恨德行无凭。

## 二、陶渊明晚年痼疾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陶渊明久困于痼疾，促使其生活方式与诗歌创作几乎发生了同步的变化。清人顾易《柳村谱

陶“义熙十二年丙辰”条云：“有《示周祖谢三郎诗》……有《八月于下渚田舍获诗》。按公自昔躬耕抱疾，至此垂老而犹作苦，然《晋传》云‘不营生业，家务悉委之儿仆’，当是年愈高、疾愈剧，亦不复能作苦也。此后获诗亦不再见。”<sup>[10]41-42</sup> 顾谱明确把《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渚田舍获》定为陶渊明耕获诗的绝响，而且指出此后他“年愈高、疾愈剧，亦不复能作苦也”，是极有见地的。不过，如果把陶渊明染疾前后的诗歌创作作一番通盘比较与研析，就可以知道痼疾对其创作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耕获诗的单一范畴。

### 1. 从“力耕不吾欺”到“嗟来何足吝”

先秦儒家宣扬“禄足以代其耕”（《孟子·万章下》），认为耕稼乃“小人”之事，无涉于“大人”君子之道。大约在归耕之前，陶渊明已不满于先儒的这一偏见。《劝农》诗云：“舜既躬耕，禹亦稼穡。远若周典，八政始食。”亲预农事之后，他更加坚定了“躬耕自资”的信念，《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云：“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躬耕有年之后，乃以“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二首》其二）自勉勉人。他所遥慕心仪的古代高士如长沮、桀溺、荷蓑翁等人（见《劝农》、《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渚田舍获》、《扇上画赞》等诗），也都是安于躬耕、自食其力的典范，且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不耕而食者报以鄙夷不屑。陶渊明也曾质问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基于这样的心态，陶渊明不惮劳苦，励志躬耕十余年之久，并创作了《归园田居五首》、《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渚田舍获》等一批经典的耕获诗，其他如《归去来兮辞》、《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和刘柴桑》、《饮酒二十首》的若干诗篇、《移居二首》其一、《杂诗十二首》其八等作品也略涉耕劳之事。这些诗描写了他安于躬耕、栖居田园的丰富人生体验，也形成了他平淡深永的独特诗风，具有后人不可企及的艺术魅力。

然而痼疾缠身之后，陶渊明虽然也偶尔“朝为灌园”（四言《答庞参军》），从事一些体力较轻的劳作，但与前期的励志躬耕相比已不可同日而

语。《晋书》本传说他“不营生业，家务悉委之儿仆”，应有事实依据。在《有会而作·序》中，他仍以“颇为老农”自居，不过整首诗却是一首地道的叙贫求食之作：“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羨，孰敢慕甘肥。怒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恨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为了生存，他摒弃“不食嗟来之食”的古训，心存感激地接受他人的赈济。据《晋书》本传，江州刺史王弘与他相识后，“至其酒米乏绝，亦时相贍”，可与其诗相证。又《乞食》诗云：“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总之，在老迈衰弱、贫病交加的情况下，陶渊明已无法维持“躬耕自资”的生活方式，不得不背弃“力耕不吾欺”的人生理想，亦不得不接受必要的贍济。

### 2. 从“栖迟固多娱”到“慷慨独悲歌”

陶渊明“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其十六），虽“短褐穿结，箠瓢屡空”（《五柳先生传》）而不改其乐，大得颜子之风。稍长之后，进一步养成了“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和郭主簿二首》其一）的恬适情趣。在酝酿归耕期间，他虽再次经历“劲气侵襟袖，箠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的严峻考验，但依然坚定地表示：“平津苟不由，栖迟诘为拙。”（《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在由酝酿归田到躬耕自得的漫长生涯中，他不断地丰富自己栖居自娱的生活方式。其诗自叙云：“清琴横床，浊酒半壶。”（《时运》）“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连雨独饮》）“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其五）“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移居二首》其二）抚孤琴、品浊酒、采秋菊、眺南山、读奇书、赋新诗，其生活的确是丰富多彩的。在他的一系列诗篇中，还把家乡的春山、秋峰、芳菊、孤松、飞鸟、新苗、桑麻等寻常景观与平凡风物融创为令人神往的艺术世界，难怪他为此而自豪：“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九日闲居》）甚至在一场夏日火灾将他的全部

宅室付之一炬的情形下，他依然气定神闲地声称：“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总之，励志躬耕解决了他与家人的口腹之需，而琴书自娱、诗酒相乐大大充实了他的心灵世界，并反过来进一步坚定和巩固了他的躬耕志向。

然而身染痼疾之后，陶渊明开始受到顽疾与饥寒的双重困扰。虽然后期诗篇尚不失君子固穷的本色，但却明显增强了对内心孤愤的抒写，《咏贫士七首》就是其中的代表作。组诗所一一称道的先贤如荣叟、原生（原宪）、黔娄、袁安、仲尉等人，都是安贫守贱的典范，这与前期诗中心仪长沮、桀溺、荷蓑翁等自食其力的高士相比，显示出心态的微妙变化。组诗还集中而细腻地描写了自己的艰难处境。此时他面临着饥寒交至的极端困窘：“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其二）“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其三）此时他已无心研阅诗书，还得白受家人的牢骚：“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其二）同时也透露了对家人的愧疚与无奈：“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其七）少壮时代，陶渊明自命为箪瓢晏如的五柳先生。进入中年，他乐于做安心耕躬的田园诗人。而组诗中的他，虽然不无尚友先贤、安贫守贱之意，但更多地呈现出病穷困乏、每不如意的老迈沧桑之态。

陶渊明晚境之凄苦，在上引《有会而作》、《乞食》诗中也有相似的表现。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引赵泉山评《有会而作》曰：“此诗述其艰食之惊，尤为酸楚。‘老至更长饥’，是终身未尝足食也。”<sup>[11]下册 215</sup>更确切地说，该诗表现出的乃是其晚年饥困与悲苦俱增的艰难情态，与少壮时箪瓢晏如的超然心境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又苏轼《书渊明乞食诗后》云：“渊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谢主人，此大类丐者口颊也，哀哉哀哉！非独余哀之，举世莫不哀之也。”<sup>[11]下册 66</sup>清代王懋竑亦作《书渊明乞食诗后》曰：“渊明盖自度其身之必以穷饿死，而卒无以报也。其固穷之节，守死不移，已见于此诗矣。”<sup>[11]下册 69</sup>但也有明清学人在没有全面考察陶渊明写作此诗具体情境的前提下，对诗人乞食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并对诗旨作出种种臆断，贬之者认为本诗不过是“写其玩世不恭耳”，

褒之者认为其中寄托了诗人的“板荡陆沉之叹”，或“不事二姓”的遗民之志<sup>[11]下册 67-69</sup>，索解愈深，离真相愈远。

汉魏乐府，至东晋而中衰，陶诗亦罕用乐府旧调，但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颇似刻意“效古”。“楚调”原属汉乐府相和歌的一种，而《怨诗》为“楚调”之一，《乐府诗集》所收《怨诗》系列的曲辞，无一例外地贯穿着悲怨凄楚的情调<sup>[12]</sup>，陶渊明这首诗也将“题中‘怨诗楚调’四字，写得淋漓”<sup>[11]下册 73</sup>：“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髡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蚋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该诗大概作于与庞主簿、邓治中即将离别之际，故有“离忧凄目前”之语。但全诗并不属意于别情，而是以质问天道、鬼神开篇，然后从弱冠时的不顺写起，历叙丧妻之痛以及旱灾、虫灾、水灾等种种考验，缘此积年怨愤，篇末才发出了“慷慨独悲歌”的激楚之音。这与得痼疾之前的平和诗风相比，反差是十分巨大的。

### 3. 从“浪莽林野娱”到“负痾不获俱”

“性本爱丘山”，乃是陶渊明走向躬耕的原动力。归耕之初，他在诗中创造了“羈鸟—归鸟—栖鸟”的系列隐喻意象（分别见《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归鸟》、《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等诗），以示其归田自得之意。曾有学者指出：“陶渊明最为看重的是心灵的安放，所以他诗中常见‘家’、‘庐’、‘居’等字样，这不只是他的安身之处，更是心灵的寄所。”<sup>[13]</sup>归田之后的陶渊明确实倾心于把家乡的田园山水化成自己诗意栖居的自由世界，真正去体验“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的闲雅情致。若无伴侣，他就只身孤往，自得其乐。在《时运》诗中，他以叠章形式叙述了一次暮春时节“偶景独游”的体验，前二章云：“迈迈时运，穆穆良朝。袭我春服，薄言东郊。山涤余霏，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载欣载瞩。人亦有言，称心亦足。挥兹一觴，陶然自乐。”《归园田居五首》其五则叙述了一次山行的经历：“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山涧清且浅，遇以濯我足。”有时他也选

择时日,携家人同行。其诗云:“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归园田居五首》其四)又:“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酬刘柴桑》)移居南村之后,他改与新邻同游。如:“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移居二首》其二)又:“辛酉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共赋诗。”(《游斜川序》)从以上诗篇可以看出,陶渊明的这一爱好持续了十来年之久。

自从痼疾缠身之后,陶渊明“负痾颓檐下”,行动自由大不如前,此后描写山水之乐的诗篇几乎绝迹。义熙十三年(417),刘裕率大军平定关中,国家稍呈统一气象,适逢友人羊长史奉史入关,陶渊明颇欲远游但却力不从心,故其《赠羊长史》诗云:“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踰。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闻君当先迈,负痾不获俱。路若经商山,为我稍踟蹰。多谢绮与角,精爽今何如?”痼疾诱发“脚疾”之后,陶渊明行动更加不便。《宋书》本传谓:“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潜尝往庐山,弘命潜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潜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sup>[14]</sup>栗里去家本不太远,但他还是不得不借助于人力之“篮舆”才得以遂行。

#### 4. 从“负杖肆游从”到“无复东西缘”

躬耕期间,陶渊明一方面安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宁静生活,同时也不废群居之乐。无论是他“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园田居五首》其五),还是“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饮酒二十首》其十四),都给他的平淡生活增添了许多喜乐。在徙居南村并结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新邻之后,陶渊明还会偶尔主动出访。其诗云:“游好非少长,一遇尽殷勤。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负杖肆游从,淹留忘宵晨。”(《与殷晋安别》)他与新邻之间形成了良好的默契,或共赏奇文,或登高赋诗,他们“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二首》)。彼此之间珍惜相聚的欢乐:“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他在五十之年还曾与“二三邻曲”组

织了一次斜川之旅,他们“临长流,望曾城……欣对不足,率共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游斜川序》),大有效法晋人金谷之会、兰亭雅集的意味。

自从身染痼疾之后,陶渊明被迫困居在家,无复朋从往来之好。其四言《答庞参军》诗云:“岂无他好,乐是幽居。”其中实有不得已的苦衷。故五言《答庞参军》诗云:“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十分含蓄地道出了自己交游零落的处境。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多病故人疏”条云:“唐包佶岭下卧疾,寄刘长卿诗云:‘唯有贫兼病,能令故人疏。’盖用孟浩然‘多病故人疏’与杜子美‘故知贫病人须弃,能使韦郎迹也疏’。”<sup>[15]</sup>看来贫病而致人疏远,乃人世之常情。因此,庞参军的眷顾给他带来意外的惊喜,以至于“三复来贶,欲罢不能”,并说:“自尔邻曲,冬春再交,欵然良对,忽成旧游。俗谚云,数面成亲旧,况情过于此者乎?”(五言《答庞参军》序)诗中亦开门见山地写道:“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大有一见如故之意。清人蒋薰亦评四言《答庞参军》曰:“相见恨晚,相别恨远,眷恋依依,情溢乎词,视《长沙公诗》,真天渊矣。”<sup>[11]下册 20</sup>事实上,陶集中虽赠答诗不少,但大多罕叙甚至全然不涉交情,非独于族人长沙公如此。对于五言《答庞参军》的特殊性,梁启超亦曾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中略有论及:“集中送别之作不甚多。内中如《答庞参军》的结句:‘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只是很平淡的四句,读去觉得比千尺的桃花潭水还情深哩。”<sup>[11]上册 272</sup>此无他,在陶渊明幽居日久,倍感寂寥之际,惟有庞参军赏其高趣,频顾其园,并赠之以诗。彼以良善之意来,陶渊明也报之以赤诚,故而在四言、五言两首答诗中渗透了自己对友人的感怀、珍重、思念、惜别、勤勉、祝愿、期盼等一片肺腑之情,读来亦感人至深。

要之,在得痼疾之前,陶渊明与友朋、近邻交往频密,来去自由,而在得痼疾之后只能被动地等待客人“每每顾林园”,前后判若两人。随着交往的减少,相关应景之作也随之趋少。五言《答庞参军》序云:“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洵非虚语。

## 结 语

上述一系列对比分析充分表明,身染痼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陶渊明的生活轨迹,也在其诗歌创作进程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转折性作用。概而言之,痼疾终止了他的躬耕生活,也使其创作由此前的躬耕主题与欢娱情调一变而为饥困主题与凄苦情调。此外,痼疾还妨碍了他的正常游乐,并导致游赏山水、友朋往来等曾经熟稔的诗歌题材逐渐淡出了他的创作视野。

## 参考文献:

- [1][唐]李善注.文选(第六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2][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50.
- [3]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
- [4]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47.
- [5]李景荣,等.备急千金方校释[M].北京:人民卫生

- 出版社,1998:243.
- [6][唐]王焘,撰.高文铸,校注.外台秘要方[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83.
- [7]郭霁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上册)[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460.
- [8]王瑶.王瑶全集(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486.
- [9]龚斌.陶渊明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526.
- [10][宋]王质,等,撰.陶渊明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1]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2][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610-620.
- [13]罗家宜,刘润芳.诗意的生存与陶渊明[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0,(6):103.
- [14][梁]沈约.宋书(第八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88.
- [15][宋]吴曾.能改斋漫录(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新一版):207-208.

(上接第162页)由此滋生的跨文化的各种方法,基本回应了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中的哲学基础、价值原则、理论资源、创新路径、研究模式。这样,以中国文化诗学为范式的比较文学,才能够以自己的理论观点与西方各种理论进行平等对话,在实际上参与世界文学理论的重构工作。于此可见,跨文化的诗学,是比较文学学科建构的基本路向。

## 参考文献:

- [1]王向远.比较文学学术系谱中的三个阶段与三种形态[J].广东社会科学,2010,(05):130-136.
- [2]吴海清.文化诗学的批判性和实践性——当代中西文化诗学反思[J].文艺争鸣,2012,(4):69-74.
- [3]John Brannigan. 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M]. St. Martin's Press, 1998:83.
- [4]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J].文学评论,2001,(6):35-40.
- [5]李春青.中国文化诗学的源流与走向[J].河北学

- 刊,2011,(1):83-90.
- [6]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化对话的一种策略[J].中国比较文学,1996,(2):1-10.
- [7]童庆炳.寻找文学理想的灯火[N].文艺报,2010-10-15.
- [8]曹顺庆.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与建构[J].中国比较文学,2003,(1):70-84.
- [9]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1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102.
- [10]顾祖钊.论中国文论的三部曲——兼及中国文化诗学的建构[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92-100.
- [11]钱中文.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研究[C]//金元浦,主编.多元对话时代的文艺建设.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13.

(责任编辑 岳毅平)